

## 中国经济的“拉美化之忧”——FDI 是魔鬼还是天使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在 FDI 流量一再创新高的时候，对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质疑，开始汇成一种声音，一些在工商界和学术界声名显赫的人们问道：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应该由谁来主导。

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争论在过去 20 年里从未停止过，如今这一争论又迎来了一个高潮。直接而尖锐的提问者同时来自于工商界和经济学界，他们有着同样主题的质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绩和效果怎样？汽车、零售等领域是否对外资过度优惠？外资在多大程度上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挤压？外资是否带来预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经济存在“拉美化之忧”吗？

2003 年，中国吸引境外直接投资(FDI)535 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预计 2004 年还会有所增长。FDI 是流入中国的外资最主要的部分，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吸收 FDI 近 5000 亿美元，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近年来中国 FDI 年流入量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均在 10%以上。

但是，在 FDI 流量达到历史峰值的时候，对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质疑，却开始汇成一股强大声音。

这是一个巧合吗？

### FDI 与中国的“拉美化”之忧

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是较早发言的工商界人士之一。从 2002 年开始，张不断在各种场合反复提起国内零售企业在扩张上遭到的“非国民待遇”。他发现，在零售行业中外资更受欢迎，得到的优惠也更多，而国内企业在扩张时往往受到限制，并面临着被外资垄断的危险，沃尔玛、家乐福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零售企业的终结者。

这一切令作为本土企业家的张宏伟感到不平与不安，而在寻找对策的过程中，他的思考也在不断地延伸，他提出：零售业体现了一个国家制造业、流通业和金融业的合力，对国家战略具有根本性影响，一旦被外资垄断，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国的国家竞争力。

如果外资掌握了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那么后果将会怎样？张宏伟式的担忧

绝不是杞人忧天。

2003 年 12 月，“2003 中国企业领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开幕。主办方“希望企业领袖预测未来三五年的产业趋势，探讨领先企业的战略转型和拐点”，但是令主办方有些意外的是，大会一开幕，到场的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警惕。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衡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附录 1]。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资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的 GDP 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如今的巴西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信息、电信、食品、医药等行业已经被外资控制，巴西前 100 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国外的投资虽然暂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国际垄断资本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带回母国——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所谓的“**增长而不发展**”的现象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

简单地把中国和拉美相比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鉴之下，这种担忧显得不无道理：在新的战略机遇时期，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优越于本土企业的政策优惠，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国的企业还有机会成为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吗？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引述了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的观点：外资在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国内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行严格的控制，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已经非常高。张维迎强调，国家应该给民营企业的手脚松绑，创造一个对民营企业发展更为有利的环境，大量废除现有的一些管制。

张维迎的发言获得了企业家们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也注意到，从张宏伟一个人的独白，到中国工商界和学术界的集体出声，外资讨论的立足点也转向了商业利润和国家利益。本土的民营企业从关注自身企业的成长，转向了关注行业

发展，并和学界一起共同站到了关注国家竞争力的高度。

## 市场换来了技术吗

本土企业被边缘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拉美化”的另一面在于外资输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帮助极其微弱。在中国，也许没有任何别的行业像汽车工业这样依赖合资模式，中国一贯的“市场换技术”政策也是在汽车工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外国品牌汽车占领中国的速度如此之快，力度如此之大。就像是一觉醒来，在上海中山公园地铁站等待地铁的年轻上班族们，忽然惊讶地发现，月台对面所有的灯箱广告都换成了一汽和丰田合作生产的“花冠”汽车。极具冲击力的大幅广告让每个人感到眩晕，而这一款所谓合作生产的“花冠”，其实完全是日本的品牌和技术，此前在日本市场销售甚好。

不仅仅是花冠，如果要问一个中国家庭的购车计划，他多半会告诉你一串这样的选择：别克凯越、大众帕萨特、广州本田、丰田威驰……如果有耐心等待的话，中国的消费者很快还能买到“中国制造”的宝马和奔驰。可以看到的场景就是，一辆辆汽车正以无比迅猛的速度从合资企业的组装车间下线，驶向无数的中国家庭。需要想象的是，一批批外汇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合资方母国的银行。

关心中国汽车产业的人悲哀或是欣喜地发现，稍有实力的汽车企业都采取了合资模式，并且从 2002 年开始，中国的汽车（主要是轿车）工业进入井喷式的增长阶段，消费市场空前膨胀。现有的合资企业出于商业考虑，无暇也不愿进行本土品牌汽车的自主开发。有关政府部门也逐渐意识到自主开发能力缺失的严重性，为此，国家科技部委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进行《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的调研。

经过多方调研，路风得出一个令人泄气并忧心的结论：中国汽车工业迄今没有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至少已在汽车工业领域被证明失败。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中国汽车工业合资 20 年，至今没有开发出一款走向世界的自我品牌，汽车技术仍然严重滞后。而韩国坚持自主开发道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把韩国品牌的汽车推向了世界。

当然,在合资企业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人员技能的提高、工艺流程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都是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发生的。但路风显然看重的不是这些。虽然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制造出一辆汽车所需的任何零件,也能够按照图纸把一辆汽车完好地组装出来,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能自主开发制造出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因为汽车工业的开发是一项昂贵而复杂的工程,在过去的 100 年中,汽车技术的研发从来没有中断过,品牌企业最宝贵的财产在于他们长期积累的实验数据和开发经验。且不说这些不可能通过资本流动就能转移,知识产权问题就是无法绕过的槛。毕竟,合资企业在使用技术的时候,没有权力更改和后期开发。

我国高额的汽车关税和限制国内竞争的做法,使得汽车业获得了高价格、高利润的可能。关注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的汽车政策,则又在客观上忽略了本土的自我开发能力。这一切是具有危险性的:一旦中国市场完全开放,拥有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将很快甩开中国企业,进而全盘控制中国市场。既无技术也无资金优势的中国汽车工业将完全丧失自主性——所谓的“拉美化”危险已经不远。

虽然国内的吉利、奇瑞等民营汽车企业已经迈出了自主开发的步伐,上升的态势令路风等人感到几许希望,但正如前面所讲,一辆好车积累了人类 100 年的经验和智慧,吉利和奇瑞取得的成果其实非常有限。在政策没有改观的情况下,在外资挤压和政策限制双重夹缝中生存的吉利和奇瑞们,到底能走多远依然是个未知数。

## 乐观的胡祖六[附录 2]

大概谁也不会否认,20 多年来持续的引进外资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很自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外资持忧虑和质疑态度。

“FDI 是解释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态度就乐观得多。他援引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外资之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反过来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作为支撑该理论的强有力证据。

长期致力于中国、印度比较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曾指出,中国对 FDI 的依赖反映了国内民间投资不旺的病症,而且 FDI 的大量涌入可能导致对国内民

营资本的压抑。胡祖六对黄的观点“并不苟同”，在他看来，没有证据表明 FDI 挤出了“有效率的”国内投资，FDI 与民营资本是相辅相成的，并对中国资本的形成和增加就业做出了贡献。

对引进外资和技术转移的关系上，胡祖六用非常肯定的判断句表示，“FDI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技术转移，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他更看重的是 FDI 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至于技术——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只要有技术的进步，FDI 带来的这种技术转移就是有价值的。

胡祖六认为，从引进外资的总量(除 FDI 外还包括证券投资、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来看，中国并不是最突出的。2002 年中国各项外资流入接近 600 亿美元，同年流入美国的国外资本总额高达 7072 亿美元，是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 10 倍以上。

从规模变量上来看，中国引进的 FDI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也并不显得那么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在此方面都超过了中国。

胡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在能力”其实高于目前的表现。如果中国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上下功夫，改善整体投资环境，如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制与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的游戏场”，中国在 2008 年吸引 FDI 达到 1000 亿是非常可能的，而届时也无需对外资企业采取减免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5/20/content\\_332154.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5/20/content_332154.htm)

## 附录 1：拉美模式和危机与拉美化陷阱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拉美各国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增长迅速，人均 GDP 仅用 10 多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多，从 400 多美元提升到 1000 多美元，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在人均 GDP 从 1000 到 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中，危机频繁，动荡不已，经济增速滞缓，人均 GDP 再翻一番竟花了 30 年时间。同时，金融危机不断，政局动荡。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及政局变更等，因此，该模式又戏剧性地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陷阱**”。

拉美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令人深省。

大部分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全面地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重点和优先发展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并且巨额投资制造业。这期间它们实施了牺牲“三农”利益、扶持“幼稚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和一系列吸引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工业年均增长 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 6.5%。除了个别国家,大部分国家人均 GDP 一举突破 1000 美元大关。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500 美元左右。国际社会盛赞世界经济的“巴西奇迹”和“拉美奇迹”。

然而,“奇迹”背后,问题不少。最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农业发展举步维艰。虽然城市化率高达 58%,但流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工作和生活都没有保障,变成了新一代的城市贫困家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没有改善三农状况。结果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失调。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本质特点,就是重工业发展轻农业发展,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产业发展轻生态发展。这不仅是传统经济增长型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且是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从“奇迹”到“陷阱”的转变,已经在这一时期埋下了必然的隐患。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一轮经济改革,主要是改进而不是改变进口替代工业化。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贷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性开放为主。尽管在“三农”问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协调和改善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反而进一步释放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不仅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而且引发了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拉美地区无论工业经济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急速下滑,进入 80 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衰退。80 年代拉美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1.2%,人均 GDP 则是负增长 0.9%,以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世界经济的“拉美陷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拉美各国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重点是以后

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以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所谓“后进口替代”就是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进口和出口相协调、外贸和内贸相协调、外向和内向相协调。其主要内容是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国民经济外向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这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确实解决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促进了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但是，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在本质上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沿袭传统工业化及其粗放经营模式和非持续性发展模式，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经济增长型的传统发展观念、道路、模式和战略。城乡发展矛盾、区域发展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人与自然发展矛盾、国内国外发展矛盾，非但不能破解反倒扩大激化。1990 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严重恶化，GDP 和人均 GDP 增速双双下跌。整个 1990 年代，GDP 和人均 GDP 略高于 80 年代，远低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奇迹”时期，以致被称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

## 附录 2

### 胡祖六简历

现任美国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

在 1977 年前，胡祖六还是湖南长沙郊区一个农民，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胡祖六以 17 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在此获得力学硕士；

1984 年被公派到哈佛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1-1996 年先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IMF）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管。

令胡祖六一举成名的正是其在 1995 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宣读的一份年度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由胡与 WEF 另一位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共同完成。该报告获得当时的高盛 CEO 乔恩科赞（Jon Corzine，现为新泽西州参议员）的赏识，而正是此举酿成的机缘，使得胡祖六放弃 WEF 加盟高盛。而且，加盟高盛 7 年来，他已经完全融入了高盛，并成为高盛基因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他喜欢这里的工作，并充满激情。

## 张维迎简历

1959 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 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

1984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 年 9 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1994 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 年 8 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4 - 90 年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Mirrlees 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 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 1992 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 杨小凯教授简历

**杨小凯** 1988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展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

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 生平简历

原名杨曦光，1948 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6 岁时，撰文《中国向何处去？》，令康生震怒不已。身陷囹圄 10 年。拜当时牢中多位教授、工程师为师，系统学习了数学、英语、材料力学和机械学。

1978 年杨小凯出狱，先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

1979 年在武汉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相当)；

1980 年直接考上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数量经济学方向硕士学位；

1988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9 年 12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1998 年 1 月-现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成员；

1993 年 1 月-现在：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教授；

1987 年-1998 年：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6 年 12 月-1997 年 2 月：中国台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 主要研究成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 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 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 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 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pp. 462-82。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pp. 392-98。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pp. 295-301。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pp. 257-74。

## 林毅夫教授

1952年10月生，台湾省宜兰人；

1978年，获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书；

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年，回国工作，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从美国归来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

1993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称号；

1997年获得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学会颁发的约翰·克功夫爵士终身成就奖。